

在宗宋祧唐與學問性情之間*

——清代宋詩學芻論

周景耀

【提要】 宗宋是清代詩學的重要風尚，宋詩之美學特質與宋人之詩學觀念構成清人論詩、作詩的潛在指導原則。宗宋風尚之興起是身處易代之際的清人對晚明思想進行反思、並促使他們做出免蹈覆轍的文化選擇與詩學選擇的結果。針對晚明空談性理之風，清人提倡實學，落實到詩學上，強調以學問培植詩人根柢的重要性，對宋詩學問化的特質持認同態度並多有闡發；道、咸之際，時局內外交困，思想上呈現出漢宋會通的趨勢，受此影響，宋詩“以議論為詩”之特質在清人的詩學視域內備受關注，他們崇尚以理論詩，詩觀亦以主意為要。有清一代雖以宗宋為尚，並對宋詩之美學風貌進行了一定的理論總結，但不意味著唯宋獨尊、唯學問說理是舉，尚有宗唐、宗漢魏六朝與之相應，論詩亦不廢性情。亦即，由宋代即已開啟的唐宋詩之爭，在清人的詩論中體現為一種相容唐宋、性情學問並置、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融的詩學局面。但隨著現代詩學觀念的介入，這一局面被打破，論詩呈現出偏於一端之情狀，此現代轉變值得深思，藉此回溯清人之詩學探索無疑具有參照價值。

【關鍵詞】 宋詩學 宗宋祧唐 學問性情 學人之詩 詩人之詩

【中圖分類號】 I207.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0143 - 12

明清易代之變刺激處身歷史節點的士人對前朝學術文化進行反思，促使他們做出免蹈覆轍的文化選擇與詩學選擇。晚明文化之弊在於不學無術空談性理，即所謂的“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因此，清代學術思想的展開與繁榮是以對明代文化之失的反思為基礎的，其基本氣質是淑世的與崇學務實的。在這樣兩種文化精神的薰染下，有清一代鴻儒碩學輩出，有力地矯正了空疏之學風，而蔚成清代學術之鼎盛。

落實到詩學上，清人強調以學問培植根柢的重要性，對詩與學問關係的論述成為清代詩學史上的重要話題，這與對晚明空疏學風的反思在內在思想邏輯上具有一致性。正所謂“詩非學之而

* 本文係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立項重點課題“現代宋詩學研究”（項目號：18NDJC17Z）階段性成果。

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期工而自工”，^①方以智在《通雅·詩說》中記錄了一次與友人姜如須論及詩與學關係的談話，意在強調學問對創作的重要性，他記錄道：“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嗤點。且從王、孟、錢、劉入，而深造及此可也。才各有限，學必深造，然後自用所長，豈必執一而相訾耶？”^②錢仲聯將清人對此問題的看法歸納為八個方面：一、學問原本六經；二、學問要致用；三、多讀書則取精用宏；四、多讀書增加才氣；五、糾正空疏之敝；六、糾正偏重妙語之敝；七、空靈也要從學問中來；八、多讀書可以醫俗。在主張博學，主張讀書的前提下，在詩學本身，也強調廣博學習。^③故可說清代詩人，多是博學之士，其詩不墨守一代一派，此與明代詩風大異其趣。

正因清人將學問作為詩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才會對嚴羽“別材”、“別趣”說有所批評，認為“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④需要注意的是，嚴羽對詩中堆砌學問的批評，針對的是宋詩，即其所言：“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⑤嚴羽批評的是宋詩注重學問的詩學特質。清人對嚴羽無視學問的批評，從反面印證清人對宋詩學問化的認同。某種意義上，清人對宋詩的推崇亦體現為一種救前朝詩學之弊的努力，是對明代文化之弊進行反思的組成部分。劉世南即指出宋詩與清人注重實學之間的關係，他說：“唐詩經明代前後七子的摹擬，久成空腔，人情好新異，故轉而宗宋；宋詩質實而深刻，不比唐詩空靈而膚廓，杜、韓在唐皆為別調，故直啟宋詩而清人宗宋者，亦無不上溯杜、韓。清人重實學，力避明人之空疏不學，清初重經世之學，中期重樸學，後期講求經濟以救亡圖存，此種學風自影響於詩風而溯唐宗宋。”^⑥清人對宋人以“以才學為詩”深表認同，所謂宋人精詣，雖各有表現，卻“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⑦翁方綱即云：“詩自宋元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此後接宋元者，全恃真才實學以濟之。”^⑧黃宗羲亦云宋人學唐“雖鹹酸嗜好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群言。上下數千年之間，始成其一家之學”。^⑨清人亦以宋人重學的方式以“博其趣”，^⑩這些都與清代“道問學”的文化氛圍密切相關，^⑪正是借由清人惟學是問的博學精神，乃有宋詩之意義之發覺，亦使得清代的宋詩研究在文學理論史上佔有一定地位。

清人認同的宋詩美學風貌還有為嚴羽所批評的“以議論為詩”的一面。宋詩的這一特質，使之與清代的內在文化邏輯產生相合之處，繼而成為被推崇的因由之一。若清前中期意在以宋詩之學問化以救晚明詩學之弊，那麼，晚清宗宋則在重學問的同時，對宋詩的說理特質亦有所關注，這在學術理路上呈現出會通漢宋的趨向，此自是晚清歷史處境催逼的結果。道、咸之際，國勢衰微，內外交困，學術上以考據為主的漢學脫離社會現實，流於枯槁，頹勢日深，不能為風雨飄搖的時代提出解決方案。在此情勢下，宋學興起，但宗宋非以廢漢學為前提，而是會通漢宋，並有今文經學與經世思想合流之變，這些共同開啟晚清七十年間學術思想的大幕，宗宋詩風亦隨此學術大勢愈益高揚。梁啟超認為洪楊亂事前後，思想界引出三條新路，其中之一是“宋學復興”，因乾嘉以來，“漢宋門戶之見極深，‘宋學’二字，幾為大雅所不道，而漢學家支離破碎，實漸已惹起人心厭倦。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後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後，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⑫因宋學得以產生的歷史境況與晚清之內外交困的局面相似，故宋型文化為清人所關注。宋型文化的特徵之一是宋人在世亂的處境中以“內省而廣大”、“反求諸己”作為精神追求的路徑，這種精神追求使得宋人“從其政治心態而言，則大都富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熱情，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於經世濟時的功業建樹中，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⑬宋型

文化的這一自省以修身、廣大以致天下的精神，直接為清道、咸問諸中興名臣承續與發揚，所謂“自詡中興者，大半皆當朝官中篤行勵學之士有以放之也”。^⑭從祁寯藻到曾國藩莫不認為應在文化方面昌明理學，以此救國家之衰微局面。

理學復興使清人對宋詩議論說理的特色多有認同，亦常以理論詩，清人詩觀亦以主意為要，但亦不廢性情。王夫之云：“詩源情，理源性，斯二者，豈分轅反駕者哉？不因自得，則花鳥禽魚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取之廣遠，會之清至，出之修潔，理顧不在花鳥禽魚上耶？”^⑮他又道：“‘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謂無理有詩，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爾”，^⑯他將情與理合而論之，並將詩中之理與名言之理加以區別，即意在強調以理入詩並無不可。葉燮、黃宗羲、厲鶚、桐城派、同光派等對此均有較為正面的論說，以詩說理作為宗宋詩學的話題在有清一代詩人學者間被廣泛關注，在此不一一述及。有必要提及的是，此話題至翁方綱倡言“肌理說”而為一大轉折，他從形式技巧、篇章結構到內容義理將此話題在理論上進一步系統化了。他說：“詩之於文辭，又其諧之聲律者。然‘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淵泉時出，察諸文理焉；金聲玉振，集諸條理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諸通理焉。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⑰。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翁方綱提倡‘肌理’，強調以學問為詩來取代以性靈、才情為詩，在宗旨上與宋代江西詩派有相謀合之處，因而翁方綱在詩派上宗江西詩派。他的論詩主張切合於當時文壇的學術風氣，故在詩壇上得以蔓延。可以說他開了清代‘宋詩派’的風氣之先，在清代文學史上有著一定的影響和地位。”^⑱翁氏之後，宗宋漸成晚清詩學主潮，而彼時詩家多染宋調亦是不爭之事實。

二

唐宋詩之爭一直是中國詩學史上的重要話題之一，自宋詩誕生之日起，唐宋之爭即已開啟，至清對此問題的關注與討論愈益突出、深入。清代宋詩學得以建立的要義之一即是如何解決唐宋之爭的問題，學界一般以宗唐、宗宋或兼融唐宋等類型來界定清代的唐宋之爭，抑或分期論此問題的演變過程，這些做法自不掩其合理性。但我們認為，與其以“爭”論唐宋詩在清代的接受狀況，不如說唐詩是清人建立宋詩學的參照，亦即清人對宋詩美學價值的發掘與建構並不以貶抑唐詩為前提，乃意在對唐宋詩之獨特品格進行更為清晰的界定與闡發，以期凸顯宋詩之主體地位，使之與唐詩呈現二水分流、匯通相融的狀態，這一點在晚清宋詩派那裡體現的極為明顯。因此，我們不單純就唐宋之爭作階段性描述，亦不簡單停留於優劣高下的宗派意氣之“爭”的敘述，而將注意力集中於詩學內部，揭示唐宋詩作為一種美學範式在清代的形成過程與表現形態。之所以重提唐宋之爭的老話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唐宋之爭是進入現代後仍在延續的重要詩學問題，在現代詩學的視野內，唐宋之爭呈現出非此即彼的“爭”的局面，於是有盛行至今的崇唐抑宋、宋不如唐之論，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傳統詩學評價體系的反動，自然也為我們體察詩學觀念與審美範式之變提供了樣本。

宋人自出己意以為詩，變唐音而成宋調，使宋詩與唐詩一道構成中國詩歌史上兩大詩歌典範，此後詩家莫不在宗唐祧宋之間作出判斷與抉擇。明代宗唐抑宋為詩壇主流，詩必宗唐幾成明人共識，並認為宋、元為詩亡之世，所謂“詩衰於宋”；^⑲“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為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⑳面對明人尊唐黜宋、摹擬浮薄的詩學狀況，清人如何打破這種局面以維護宋詩的獨特性呢？他們從詩文代變的角度，看待宋詩與唐詩及中國詩史之內在

源流關係，並在充分發掘宋詩特質的基礎上，建立起唐宋詩並舉的存在格局。

清人以主變觀念看待宋詩之變，大抵可分為兩種情形：一為宋出唐者，一為宋別於唐者。前者為後者之前提，後者是前者之發展，故貶抑宋詩實則是對唐詩認識不足的表現。因此，“肯定宋詩，可以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強調宋詩與傳統的相生性，主張宋詩並沒有違背傳統，這種肯定形式並不改變傳統詩學的價值系統。其二，是承認宋詩與唐詩傳統的不同，然後為宋詩的獨特性尋找理論根據，這樣他們的詩學就必須超出原有的價值系統”。^①我們便是從這兩方面看待唐宋詩之爭的。

錢謙益針對明代前後七子摹擬復古之風批評道：“獻吉以復古自命，曰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天地之運會，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而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再辟乎！”^②葉燮在《原詩》中亦批評七子“不讀唐以後詩”，他認為：“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③對前後七子擬古不知求變的批評，意在指出詩文正如人世之景物，時刻處於“新新不停，生生相續”的代變過程中，故風雅各代有變，代有其詩。以此為理論依據，錢謙益認為宋詩在詩史上亦有其存在之價值。他說：“嗟乎！天地之降才，與吾人之靈心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續，有三百篇則必有楚騷，有漢、魏、建安則必有六朝，有景隆、開元則必有中、晚及宋、元。”^④錢、葉一方面以一種非線性的詩學觀看待代代相續的關係，同時清人也不否認各代詩文新出之獨特性。如針對嚴羽對宋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批評，周容即反駁道：“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滄浪之言，無不奉為心印。不知是言誤人不淺。請看盛唐諸大家，有一字不本於學者否？有一語不深於理者否？”^⑤黃宗羲也指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莫非唐音”。^⑥他進而指出“善學唐者惟宋”，他認為宋人學習白體、昆體、晚唐體，江西詩派學杜而來，乃成“宋詩之淵藪”，又指出歐、梅學李白、韓愈，王安石、楊萬里得體於唐絕，正因如此“瀝液群言”，乃有宋詩之“自成一家”。^⑦葉燮指出蘇軾詩與韓愈詩之相續性，蘇詩“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一大變也，而盛極矣”。^⑧此可視為代代相續，宋出唐者，清人對二者淵源關係的論說甚多，此不一一引述。清人以代變觀念論唐宋詩關係的做法，既是對明人崇唐抑宋的所謂唐宋之爭的反駁，也是晚清唐宋兼融詩觀的開啟。

正是在詩歌代變相續的基礎上，才有宋詩之自成面目，即如袁枚所言之“宋人學唐而變唐”，若無新變，則“不足以為宋也”。^⑨吳之振在《宋詩鈔·序》中亦云：“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為腐。”^⑩陳衍“宋人皆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的說法亦是就此而論。錢鍾書指出，明人對宋詩學唐而不像唐的批評，雖不錯，但未認識到“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與價值所在”。^⑪那麼，宋詩的獨特“精神”與“創造性”是什麼呢？

首先是對宋詩“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⑫的富有氣勢的徑露風格的闡發。清人常通過與唐詩對比的方式闡發宋詩徑露的一面。沈德潛云：“唐詩蘊藉，宋詩發露，蘊藉則蘊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⑬這是說因宋詩主意乃有“發露”“盡言”的結果。吳喬亦持是論：“唐人於達情，宋詩主議論。”因此，“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⑭潘清在《挹翠樓詩話》中說：“唐詩主情，宋詩主氣。主情則抑揚吞吐，涉筆便深；主氣則務求暢達，非淺即露。”^⑮“主氣”

是指宋詩由議論直達、發露盡意、直遂暢快產生的氣勢，此有別於唐詩的主情蘊藉。正因宋詩主氣，故多“猛起奮末之音”。^⑥葉燮將宋詩這一特徵表述為“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⑦何曰愈則從宋詩之徑露、唐詩之蘊藉的優劣對比中揭示宋詩這一特色，他指出：“唐詩多深厚，意在言外，故多蘊藉；宋詩尚纖巧，意躍筆端，故徑露。而優劣亦在此分矣。”^⑧在清人眼裡，宋詩主氣主意已成普遍認識，對此特色的正負面評價聚訟紛紜，此不贅述。

其次，與主意亦有關聯的“精深細密”在清人看來是宋詩的又一特色。邵長衡論詩必趨宋詩時云：“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蓋宋人實學唐人而能零逸唐軌，大放厥辭。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⑨“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正是宋詩“精深細密”特質的體現。翁方綱對此甚為推崇，其“肌理說”即要求詩歌應“細肌密理”，翁氏以此論宋詩曰“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愈加細密，蓋刻抉入裡，實非唐人所能囿也”。又說：“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胸闊也。”他批評吳之振《宋詩鈔》所選詩專於“硬直一路”，是不識宋人“精腴”之理的表現。^⑩翁氏之“細肌密理”的基礎是真才實學，所謂“造物精微之秘，衷於實際”，宋人正因具備真才實學方有精深細密風格的形成。

再則，宋詩之“精深細密”除表現內容廣泛外，還體現為宋詩在詩歌結構、句法、用字等方面的精心營構，以此實現對慣用表達的突破。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發揚韓愈詩求新奇的特點，用僻典險韻、拗律拗句形成一種清新奇峭、艱澀瘦硬的詩風，與主意之徑露相對，此為宋詩的又一面相。宋人陳岩肖在《庚溪詩話》中指出宋詩“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戾，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⑪對此，汪懋麟以形象化的語言指出：“若宋、元諸作，則異脩奇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日新，學之者必貴家富室，無所不蓄，然後間出其奇”。^⑫他認為宋詩之新奇與博學是分不開的，若無博識而欲出奇，只能帶來“酸寒”的結果。關於瘦硬，胡應麟云：“大抵宋諸君子以險瘦生硬為杜”。^⑬曾國藩云：“參以山谷之倔強，而去其生澀，雖不足以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⑭針對宋詩這一瘦硬生澀的風格，清人對此雖多有批評，但在詩歌創作中卻被繼承下來，以至在晚清宋詩派那裡形成以陳三立、沈曾植為代表的“生澀奧衍”一派，影響甚大。

宋詩風格多樣性是不爭之事實，但其較為突出的審美特質還在直達徑露、精深細密與艱澀瘦硬等方面，清人對此的論述與繼承亦較為一致。因此，宋詩美學特質在清代的明晰，意味著宗宋之風的愈趨深入，以及宋詩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作為參照對象的唐詩風格的明晰。也因此，唐宋之爭漸以唐宋並舉、二水分流的形式體現在詩論家的敘述中。需要說明是，唐宋並舉並非唐宋對立，亦非唐詩無宋詩之審美特質，二者的關係與其說以“爭”的方式表現出來，不如說二者呈現的是一種互文性的關係，所不同者體現在某些風格在唐詩或宋詩那裡表現的較為明顯而已，正如錢鍾書所說的那樣：“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⑮在宋以後的論者眼裡，唐宋詩風格之別大抵圍繞主情、主意展開。

對唐宋詩審美特質的并舉論說，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得到更為充分的展開，論者態度亦更為公允、無軒輊之分。錢鍾書認為“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他在此基礎上指出：“唐詩多以豐神情韻見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

勝。”^④程千帆亦持是論：“唐人之詩，主情者也，情亦莫深於唐。及五季之卑弱，而宋詩以出。宋人之詩，主意者也，意亦莫高於宋”。^⑤繆鉞的《論宋詩》一文則括盡前人祧唐宗宋之論，以持平而形象的語言辨析了唐宋詩之風格差異。至此文出，唐宋詩之審美特質乃有清晰界定。他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秾華繁彩；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唐詩如啖荔枝，一顆入口，則甘芳盈頰；宋詩如食橄欖，初覺生澀，而回味雋永。譬諸修園林，唐詩則疊石鑿池，築亭辟館；宋詩則如亭館之中，飾以綺疏雕檻，水石之側，植以異卉名葩。譬諸遊山水，唐詩則如高峰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澗尋幽，情境冷峭。唐詩之弊為膚廓平滑，宋詩之弊為生澀枯淡。雖唐詩之中，亦有下開宋派者，宋詩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論其大較，固如此矣。”^⑥又說：“就內容論，宋詩較唐詩更為廣闊。就技巧論，宋詩較唐詩更為精細。然此中實各有利弊，故宋詩非能勝於唐詩，僅異於唐詩而已。”^⑦但是，繆氏這一經數代人探尋、爭論得來的關於唐宋詩審美特質的持平之論，或曰經數代人努力得出的唐宋詩並舉的詩學認識，並未在此後的時間裡轉化為一種普遍性的詩學常識為人所知，卻在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重又回到唐宋之爭的對立局面。這時的唐宋之爭已非之前的傳統詩學內部之爭，而一變為現代詩學觀念與傳統詩學觀念之爭，蓋源於此，繆鉞等人的努力並不能阻擋現代詩學觀念對唐宋詩的重新判定。對此轉變，我們擬另撰文討論。

三

前文已述，清代詩學的表徵之一是對學問的重視，此與清代重學的思想氛圍有關，宗宋詩風緣此興起。學問化是宋詩的特質，故有與“詩人之詩”相對的“學人之詩”的出現。清人重學，亦不廢詩，他們追求的是學問與詩結合、性情與學問相濟。因此，對學問、性情並舉的強調在清人詩論中普遍存在，尤其晚清以後，更為顯豁與深入，以陳衍“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之論為代表。需要說明的是，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在清人及之前詩論家的眼裡並不對立，所異者在於，不同時期因政治導向與學術理路的變動會引發詩學觀念偏於一端的情形，比如明代詩學偏於性情，清代則有學人之詩的興起。概言之，學人之詩強調學問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性，可以厚植詩人之根柢，以宋詩為代表；詩人之詩強調詩人之性情，以唐詩為代表。二者相合之論，反映出清代詩學兼顧學問與性情的傾向，某種意義上是對唐宋詩之爭的回應，是一種兼融唐宋兩種詩歌審美範式的詩學策略，此策略既針對學唐產生的膚廓滑易之病而發，亦不妨針對宗宋造成的生澀奧衍之失立論，皆與當時詩壇暴露出的問題相關。

清人是在對嚴羽“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之說批評的過程中強調學問之於詩的重要性的，兼有對公安、竟陵空疏膚淺之弊的反思，這是從明末清初即開始的傾向。周容對嚴羽“別材”、“別趣”之論批評道：“此嚴滄浪之言，無不奉為心印，不知是言誤人不淺。請看盛唐諸大家，有一字不本於學者否？有一語不深於理者否？嚴說之弊，遂至竟陵。”^⑧林昌彝對嚴氏之論有所修正，在並不全然否定其說的前提下認為學問不可廢，他說：“或謂詩家者流，方謂微妙不可思議，又謂詩有別長，妙悟不關學識。吾不謂諸說盡非也，然必有立於是詩之先者，且必無連篇累什，皆無可指之實，而盡為微妙難言者也。”^⑨又借朱彝尊之言云：“世之枵腸枯腸者，每以嚴叟之論為藉口，抑知嚴叟所自為詩，特小乘辟支果耳。竹垞論詩云：‘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別材非關學，嚴叟不解事。’斯論足以執嚴叟口矣。”^⑩

以反思晚明詩學之失為基始，學問之於詩歌的重要意義日益為清人重視，以至有學人之詩的產生。清人雖強調詩之學問化，但性情之於詩之重要性亦為其所關注。

清初詩論側重於對性情的強調，因宗唐之風尚是主流。錢謙益批評格調派過於注重形式，認為詩應以性情為先，在他看來言志抒情乃詩之標準，他說：“《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⑤藉此，錢氏晚年強調性情、學問、世運共濟相融的詩學理念，即其所言：“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充其志，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柢則在乎天地世運，陰陽剝復之幾微。”兼顧學問性情，並不以顯示學問為主，仍意在以發抒性情為主，所謂“發皇忠孝惻之心”，這可視為晚清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合之論的開始。王夫之將性情視為詩之本，所謂“詩以道情，道之言路也。詩人所至，情無不至；情之所至，詩以之至：一遵路委蛇，一撥木通道”。^⑥顧炎武論詩亦以性情為主，所謂“詩主性情，不貴奇巧”。^⑦即便黃宗羲力倡宋詩，但仍以“詩以道性情”^⑧作為其詩論基礎，與王、顧二人基本一致。

雖清初諸子論詩主性情，但學問化的傾向在他們的創作中也有所體現。以顧炎武為例，其詩已呈現出學問化的特色。有學者即將顧氏詩之學問化總結為四方面，一是“以經史之學入詩”，二是“以名物考據入詩”，三是“以地志學入詩”，四是“詩歌中體現出學人嚴謹的學術精神”。^⑨這些其實也大致也可視為清代學人之詩的基本特點。但以學問入詩蔚成一種詩學風氣是從雍、乾之際開始的。其時樸學漸盛，隨此學術潮流的變化，注重以學入詩之觀念漸成風氣，若論起始，大抵可從浙派朱彝尊講起。朱氏批評嚴羽“別材”、“別趣”之說而忽視學問，認為於詩中表現學問並無不可，他在自述其詩學轉變時云：“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必借錄之……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流覽，恒資以為詩材，於是緣情體物，不復少時之隘。……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為尚。”^⑩這段話也暗示出朱氏從宗唐到學宋的轉變。正如張健指出的那樣：“朱彝尊的這種重學問的詩學直開了主宗宋的浙派以及肌理派的理論先河。”^⑪其詩之學問化體現為以詩述學、用典用事廣博而僻奧、用字講求來歷等幾方面。^⑫厲鶚承繼朱氏“詩必以取材博者為尚”的詩學傾向，談詩亦重學問，學問化在厲鶚的詩論與詩歌創作中皆有體現，二者是聯繫在一起的。全祖望說他：“讀書數年，即學為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為人所不知。”^⑬楊鍾義論及厲氏詩中“學問”之博時云：“自諸子百家雜出於神林鬼塚金石可喜可異之事，能令讀者蕩心震目。”^⑭當將學問作為詩材在詩中加以表現的時候，清初對學問與性情關係的認識發生轉變，若此前對詩歌的認識是以發抒性情為本，單純強調學問之於作詩輔助，至此則體現出以學問為本的傾向，“學人之詩”漸成普遍的詩學現象。

杭世駿針對當時詩歌崇尚學問的傾向，在理論上以學人之詩稱之：“《三百篇》之中，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余特以‘學’之一字立詩之幹，而正天下言詩者之趨，而世莫宗也。”^⑮以“學”立詩之“幹”，即視“學”為詩之本。杭氏曰：“古之為詩者由本以及末，今之為詩者務末而遺本，由本以及末，故朝夕經史，晝子夜集，優柔厭襖，無意於求工而詩益工。騫末以遺本，傭儻耳目，雕琢曼辭，實而按之，仍枵然無所得。”^⑯

杭世駿之前已有人提出學人之詩的說法，與之相近的有“文人之詩”、“儒者之詩”、“學者之詩”等概念，學人之詩在中國詩史上是早已有之的現象，如杭世駿所言《三百篇》中已存在

學人之詩。學問、性情之說亦由來已久，葛曉音指出天分性情與學力之說可追溯到唐代，至明清之際，標舉盛唐的一派文人將天分、學力作為區分盛唐詩與中晚唐詩及宋詩的主要美學標準，^⑥也因此關於詩主天分性情還是主學力之爭一併產生。但縱觀中國詩學史，對學人之詩多有駁難，學問與性情之於詩的重要性並不對等。鍾嶸在《詩品序》中對“文章殆同書鈔”之風有所批評，提倡“無故實”、“即目”、“直尋”之詩。嚴羽雖不否認學問對詩歌的作用，但其詩學傾向卻是偏於“興趣”而不重“理趣”的，明代沿襲嚴羽“別材”、“別趣”之說，對學人之詩不以為然，因有晚明詩學之弊。這種以學入詩的突出做法是喜用僻典生字，反對模仿，刻意雕琢，以求新避熟，達到生澀的“陌生化”效果。如厲鶚之詩力求“辭必未經人道”，^⑦刻意用僻典。對語言則著意雕琢，所謂“窮極雕鏤，譬如入懸崖峭穀，幾乎斷絕人跡”、“鏤心役腎，句雕句琢”。^⑧這樣做在審美上雖給人新奇生澀之感，但其流弊亦隨之產生，批評者多從短釘瑣屑、生澀僻奧、氣格不高等方面對浙派詩進行批評。沈德潛云：“今浙西談藝家，專以短釘擗趾為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真矣。”^⑨又云：“近更獵取《卮言》、《說鈴》、一切僻澀叢雜之語，以矜新奇，若宋以前之書不必更讀者，滔滔日下也。”^⑩袁枚論詩雖不分唐宋，亦重視學問與詩歌的關係，但並不過分強調學問的重要性，他“只是以性靈識力為主，學問為輔”。^⑪故強調個人之性情的袁枚，對在詩歌中表現學問的做法是批評的。他批評浙派“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⑫認為乾嘉詩壇有三病，其中之一是“填書塞典，滿紙死氣”；^⑬批評“肌理”說以考據入詩“於性情二字，幾乎喪盡天良”。^⑭確實，詩之學問化至翁方綱又至一個高潮，也從他開始清代詩學呈現出整合化的傾向，始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的詩學主張的出現。

學人之詩至翁方綱於理論與實踐兩端皆致其極，凡其擅長之考據、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可入詩，所謂“覃溪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⑮翁氏真正做到了詩以學問為本，他主張“考訂訓詁之事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⑯此可謂矯明代以來詩風空調滑淺之枉而過正矣，性情與學問遂失之平衡而偏於學問一端，實大於虛，其影響所及，至於清末。袁行雲即認為翁氏“生平為詩，幾與乾嘉考據相始終，同時及後世填實為詩者，無不效之”。^⑰效之者以弟子門人為主，如凌廷堪曾經程晉芳引薦請學於翁氏，凌氏弟子為程恩澤，程時為晚清宋詩運動的宣導者，作為其門人的何紹基、莫友芝、鄭珍等人對其主張自不陌生，以至程氏主張在“嘉慶間風行，形成‘學士詩派’，影響頗大，竟致改變北方詩壇宗尚性靈及常州兩派的詩風”，“從而形成‘南袁北翁’的局面”。^⑱有人指出這種局面是一種詩弊的反映，所謂“‘今日詩弊’，乃指南袁北翁而言。一時作者，不為隨園、甌北之佻滑，則為覃溪、竹君之考訂”。^⑲這兩種詩風至晚清民初仍有餘響，但詩學潮流已呈現出學問性情統一與兼融唐宋的整合趨勢，此為進入道、咸之世後，清代詩學轉變的一大特徵。

清代詩學關於性情與學問的思考，至晚清宋詩派以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的理論形態體現出來。具體而言，宋詩派代表人物前期為程恩澤、祁寯藻，何紹基、莫友芝、鄭珍、曾國藩等人，後期為陳三立、鄭孝胥、陳衍、沈曾植等人。此派人物雖宗宋，但不抑唐，重學問，亦不廢性情，所謂“詩也者，有別才而又關乎學者也”。^⑳經由他們，清代詩學呈現出與此前不同的樣態，其中對性情與學問關係的認識亦趨深入，以此派人物陳衍的論述最有代表性。陳衍曾述及清代詩學觀念的嬗變：

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愨，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瑞、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

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慤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斯人》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遂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刪之。故孔子又曰：“詩之失愚。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為杜為韓為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為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為若人之言也。^⑩

清一代，詩宗杜韓者，嘉道以前，推一錢擇石侍郎；嘉道以來，則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國。而何子貞編修、鄭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門。蓋以莫子偲大令、曾滌生相國。諸公率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大家為職志，不規矩於王文簡之標舉神韻、沈文慤之主持溫柔敦厚，蓋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也。^⑪

陳衍所言之“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乃針對神韻、格調二說而發。他認為神韻有失詩變風變雅的精神，格調宣導溫柔敦厚而失之愚，因在喪亂云旛的局面下，詩歌必須有所反應，故矯神韻之閑情浮響與格調之平和庸濫乃是必須，於是強調學人之詩以矯二派之空疏；強調詩之正變精神以矯二派之虛浮，而詩人亦應於亂世之際創作出變風變雅之詩，以示自家“面目性情”，否則便會出現“無以別其為若人之言”的情形，“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亦應作如此理解。故陳衍曰：“詩至晚清同光以來，承道、咸諸老，漸向杜、韓，為變風變雅之後，益複變本加厲”，^⑫可見他將杜、韓之詩視為變風變雅的代表。以此觀之，陳衍指出的、咸之際出現“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言合”的詩風就有了很強的現實意義。換言之，此論既與現實催逼有關，亦與當時漢、宋會通以求新變的學術潮流相呼應，故此論強調學問與性情、唐與宋兼融，含有對清代詩學進行總結的意味。

四

那麼，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合之論該如何理解呢？陳衍曾說：“余生平論詩，以為必具學人之根柢，詩人之性情，而後才力與懷抱相發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也。”^⑬在他看來“學人之根柢”與“詩人之性情”是成就“真詩人”的必備條件。他在詩話中錄夏敬觀評其詩語云：“不先為詩人之詩，而徑為學人之詩，往往終於學人，不到真詩人之境界，蓋學問有餘性情不足也。古人所以分登高能賦、山川能說、器物能銘等為九能，反之又東坡所謂孟浩然有造酒手段，苦乏材料耳。”^⑭又說：“求詩文於詩文中，末矣。必當深於經史百家以厚其基，然尤必其人高妙，而後其詩能高妙。否則雖工不到什麼地步去。”^⑮在他看來，深於經史百家是“學人之根柢”的根本。“詩人之性情”是指性情對詩人創作的影響，性情雖有其不可把握的一面，但並非毫無節制。在清人看來，性情是一個薰陶修養的過程，陳衍所云之以“經史百家以厚其基”當有涵養性情之意，根柢經史自是涵養性情之重要途徑，當然非止此一途。程恩澤即認為“性情自學問”。^⑯鄭珍有言：“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贍乃相濟。”^⑰莫友芝云：“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耶？”^⑱性情經過陶養的效果之一，可謂之“不俗”。何紹基嘗論“俗”與“不俗”之別：“所謂俗者，非必庸惡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無是非，或逐時好，或傍古人，是謂之俗。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見義則赴，是謂不俗。”^⑲陳衍亦曾以“不俗”論詩，這一標準非獨指詩當“避俗避熟”，亦是針對詩人性情人格而言，往

往落實為一種德性的要求。進而言之，在中國詩學史中，論及性情者，極少提倡“原子”式的未經修養與節制的性情，即或有之，亦被視為末流，很難被普遍接受，故傳統士人所論之情乃是經過陶養之情，非與今日所言之情相類。即便是大倡性靈的袁枚，也認為“多讀書，為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⑩錢鍾書即指出世人“只知隨園所謂‘天機湊合’，忘卻隨園所謂‘學力成熟’”。^⑪讀書養氣以厚根柢是中國詩學的老話題，至清尤為強調，從清初諸賢至晚清宋詩派，皆有所論，此雖可視為清代重學的體現，但亦不可否認此為修養性情的主要途徑。話說回來，陳衍所云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真意即在於學人之根柢與詩人之性情的相合，以此為標準，即能達到“真詩人”的境界。此論既針對偏重性情而不重學問根柢的滑易浮薄詩風而發，亦是對偏重學問的奧衍詩風的提醒，在當時的語境中，這體現為一種重建詩學秩序的努力。陳衍就曾對沈曾植、陳三立為代表的偏重學問的傾向有所批評，也曾一再提醒錢鍾書勿作黃仲則之類的偏於性情的詩人之詩。

陳衍在《小草堂詩集序》中指出：“詩至晚清，同光以來，承道咸諸老漸向杜韓為變《風》變《雅》之後，益復變本加厲，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厲之筆，抒哀痛逼切之辭。甚且嬉笑怒罵，無所於恤。矯之者鉤章棘句，僻澀聱牙，以至於志微嚙殺，使讀者悄然而不怡”。^⑫這裡批評的其實是沈曾植、陳三立為代表的“生澀奧衍”一派。他曾將晚清詩學略分為兩派：一派為清蒼幽峭，以鄭孝胥為代表；另一派生澀奧衍，其淵源自“《急就章》、《鼓吹詞》、《饒歌十八首》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黃庭堅、薛季宣、謝翱、楊維禎、倪元路、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近日沈乙庵、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⑬又云：“命詞薛浪語，命筆梅宛陵，散原實兼之。”^⑭雖以為沈、陳詩不盡為奇字僻典，卻不妨礙他對其生澀奧衍詩風的批評，陳衍後來選評《宋詩精華錄》的用意之一即在於此，在敘中他說：“然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竹金革，焉得命為‘律和聲、八音克諧’哉！故本鄙見以錄宋詩，竊謂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⑮故其所選宋詩以近體詩為主，以“可誦可讀”^⑯為標準，強調音節的響亮暢達。

陳衍對倚重性情為詩的批評更為嚴厲，時時強調學問根柢的重要性，這可由他對錢鍾書的告誡體現出來。陳衍讀過錢鍾書早年的詩後認為緣情淒惋之作過多，希望他作詩不可學湯卿謀、黃仲則，而應多讀少作。^⑰後又在給錢鍾書《中書君詩初刊》所作序中認為：“余以為性情與會固與生俱來，根柢閱歷必與年俱進。然性情興趣亦往往先入為主而不自覺。而及其彌永而彌廣，有不能自為限量者。未臻其境，遽發為牢愁，遁為曠達，流為綺靡，入於僻澀，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⑱或因此，錢鍾書“壯而悔之”，認為“多綺靡之作”，^⑲亦是“鸚鵡猩猩之學人語”之作，“內容甚糟”，並暗自慶倖“沒有流傳”。^⑳

對學問與性情關係的思考與討論是一個貫穿清代始終的詩學問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合之論，既是祧唐宗宋的結果，也是反思不同時期詩學之弊的結晶，具有糾偏救弊的理論意義，這是我們重提清人對此問題思考的原因之一。還因為，進入現代後，人們在詩學上對學問與性情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現代詩學觀念面前，宗宋與祧唐、學問與性情、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關係呈現出二元分離、甚至二元對立的態勢，一種借助外來思想觀念形成的“性情”論重新塑造了我們的宋詩觀以及我們的詩學觀念，並作為一種觀念性的力量影響着今日之文學研究與創作——對此關乎中國詩學大本大源的問題不能不察，此亦本文鉤沉清代宋詩學的用意之一。

- ① 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詩曆題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87頁。
- ② 方以智：《方以智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9~60頁。
- ③ 錢仲聯：《清代學風與詩風的關係》，《夢苕庵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87頁。
- ④ 朱彝尊：《棣亭詩序》，《曝書亭集》卷三九，上海：國學整理社，1937年，第484頁。
- ⑤ 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3頁。
- ⑥ 劉世南：《晚清傳統詩歌趨向》，南昌：《江西詩詞》，1989年第1期。
- ⑦④⑩ 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0、36頁。
- ⑧⑪⑭⑮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三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47、210~211、192頁。
- ⑨ 黃宗羲：《姜山啟彭山詩稿序》，《黃宗羲全集》（第十九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頁。
- ⑩ 徐世昌引鄭則厚評錢謙益語曰：“其詩博大闡肆，鯨鏗春麗，一以少陵為宗，而出入於昌黎、香山、眉山、劍南，以博其趣。”見徐世昌著、傅菊棠編校：《晚晴移詩話·錢謙益》卷十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 ⑪⑫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343~346、32頁。
- ⑬ 王水照：《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頁。
- ⑭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60頁。
- ⑮⑯ 王夫之：《古詩評選》，《船山全書》（第十四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第588、687頁。
- ⑰ 萬雲駿主編：《新編古代文學精解》，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469頁。
- ⑱ 陳子龍：《仿佛樓詩稿序》，《陳子龍文集》（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78頁。
- ⑲ 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陳子龍文集》（下冊），第55頁。
- ⑳㉑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65、480頁。
- ㉒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夢陽傳》。
- ㉓㉔㉕㉖ 葉燮、薛雪、沈德潛：《原詩·一瓢詩話·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4、9、9、67頁。
- ㉗ 錢謙益：《題徐季白詩卷後》，《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63頁。
- ㉘ 周容：《春酒堂詩話》，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7頁。
- ㉙㉚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十九冊），第44、52頁。
- ㉛ 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小倉山房詩文集》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02頁。
- ㉜ 吳之振等輯：《宋詩鈔·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
- ㉝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1頁。
- ㉞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序》，沈德潛等：《歷代詩別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6頁。
- 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 ㊱ 潘清：《挹翠樓詩話》卷三，轉引自趙永紀編：《古代詩話精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3~854頁。
- ㊲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郭紹虞主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55頁。
- ㊳ 何日愈撰、覃召文點校：《退庵詩話》，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頁。
- ㊴ 邵長衡：《研堂詩稿序》，《邵子湘全集·青門剩稿》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83頁。
- ㊵ 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82頁。
- ㊶ 汪懋麟：《宋金元詩選序》，《百尺梧桐閣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第241冊。
- ㊷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0頁。
- ㊸ 曾國藩：《大潛山房詩題語》，《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290頁。
- ㊹㊺㊻㊼㊽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3、3、653、526、520頁。
- ㊾ 程千帆：《讀〈宋詩精華錄〉》，《古詩考索·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57~358頁。

- ④④④ 繆鉞著、繆元朗編：《古典文學論叢》，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4頁。
- ⑤⑤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7頁。
- ⑤⑤⑤ 林昌彝：《林昌彝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286、294頁。
- ⑤⑤ 錢謙益：《徐元歎詩序》，《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24頁。
- ⑤④ 王夫之：《薑齋詩話》，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頁。
- ⑤⑤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頁。
- ⑤⑥ 參見黃宗義《馬雪航詩序》、《寒村詩稿序》、《景州詩集序》、《萬貞一詩序》等文對此問題的論述，見《黃宗義全集》（第十九冊）。
- ⑤⑦ 魏中林等著：《古典詩歌學問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90~392頁。
- ⑤⑧ 朱彝尊：《鵲華山人詩集序》，《曝書亭集》卷三十九。
- ⑥⑥ 魏中林等著：《古典詩歌學問化研究》，第395~398頁。
- ⑥① 全祖望：《厲樊榭先生墓碣銘》，《結埼亭集》卷二十，《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4頁。
- ⑥②⑥⑥ 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卷五，《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第240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634、643頁。
- ⑥③⑥④ 杭世駿：《沈沃田詩序》，《道古堂文集》卷十，《續修四庫全書》第14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6、296頁。
- ⑥⑤ 葛曉音：《從歷代詩話看唐詩研究與天分學力之爭》，《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15頁。
- ⑥⑦ 厲鶚：《軼事》，《樊榭山房集》（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9頁。
- ⑥⑧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69頁。
- ⑥⑨ 沈德潛：《張無夜詩序》，潘務正、李言編輯點校：《沈德潛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531頁。
- ⑦①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02頁。
- ⑦②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三，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第33頁。
- ⑦③ 袁枚：《答李少鶴》，《小倉山房尺牘》卷八，上海：國學整理社，1936年，第396頁。
- ⑦④ 陸廷樞：《複初齋詩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54冊，第361頁。
- ⑦⑤ 沈律：《翁方綱年譜序》，《翁方綱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7頁。
- ⑦⑦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308頁。
- ⑦⑨⑧①⑧②⑧③⑧⑤⑨②⑨⑥ 陳衍：《瘦庵詩序》，《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7、875、1074、1076、1018、1074、1028頁。
- ⑧④⑨③⑨⑦ 陳衍：《石遺室詩話》，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一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00、48、489頁。
- ⑧⑥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初編·金石題詠彙編序》。
- ⑧⑦ 鄭珍：《論詩示諸生時代者將至》，《鄭珍全集》（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2頁。
- ⑧⑧ 莫友芝：《巢經巢詩鈔序》，《鄭珍全集》（六），第37頁。
- ⑧⑨ 何紹基：《使黔草自序》，《東洲草堂文鈔》（一），台北：台北學生書局，1971年。
- ⑨①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 ⑨④ 陳衍：《題夏味庵詩稿後》，《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69頁。
- ⑨⑤ 陳衍：《宋詩精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頁。
- ⑨⑧ 錢鍾書：《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488頁。
- ⑨⑨ 錢鍾書：《得孝魯書卻寄》，湖南安化：《國師季刊》，1940年第6期。
- ⑩⑩ 錢鍾書：《槐聚詩存》，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頁。

作者簡介：周景耀，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中文系講師，博士。浙江寧波 315211

[責任編輯 桑海]